・新聞學研究・　第一六八期
2026 年 7 月　頁 145-200　研究論文

中共網路監控對民主社會之影響：臺灣民眾的感知與反應*

孫懋嘉**

投稿日期：2025 年 6 月 29 日；接受刊登日期：2026 年 1 月 12 日。

* 本文為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專題研究計畫之部分研究成果，文中觀點不代表補助單位立場，文責由作者自負。作者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與編委會所提供之專業建議，使本文更臻完善。

** 孫懋嘉為國防大學新聞學系副教授，e-mail: mcsndu@gmail.com。

本文引述格式：
孫懋嘉（2026）。〈中共網路監控對民主社會之影響：臺灣民眾的感知與反應〉，《新聞學研究》，168，145-200。https://doi.org/10.30386/MCR.202607.0013

《摘要》

近年來，隨著國內外媒體陸續揭露中共對海外的網路及社群平臺進行監控，已可發現中共不僅持續監控臺灣主流社群平臺的輿論動態，亦對公眾人物的社群互動與個人資訊進行系統性的蒐集與分析。然而，學界目前對中共網路監控對臺灣社會所造成的影響仍所知有限。鑑此，本研究旨在探討臺灣民眾如何回應中共對臺灣網路的監控，透過對 40 位受訪者的深度訪談，分析其面對中共網路監控時的情緒、行為、認知歷程及應對策略。

研究發現，中共網路監控感知會引發不同的負面情緒，並促使民眾在網路言論與行為上產生自我審查，其影響亦延伸至線下的人際互動層面。然而，部分民眾並未完全陷入寒蟬效應之中，而是透過隱喻、戲謔或限制貼文可見範圍等方式，規避監控機制以維持自我表達與社群連結。在應對策略方面，民眾傾向避免使用中國大陸相關產品與平臺、加強設備與軟體安全防護，並期待政府建立更完善的資安法規、審查制度與資料保護機制。整體而言，中共對臺網路監控感知不僅在個人層面會引發負面情緒與寒蟬效應，亦在社會層面限縮言論自由與公民參與的意願。

關鍵詞：公民參與、中共網路監控、自我審查、言論自由、寒蟬效應

壹、前言

根據新聞報導，深圳振華數據信息技術公司已建立一個涵蓋全球 240 萬名重要人士的資料庫，其中有約 2,900 名臺灣政界、學界與企業界等重要人士（徐薇婷，2020 年 9 月 22 日；Zhang, 2020, September 17）；上海安洵信息公司與公安部、國安部及解放軍合作，盜取包括臺灣在內等多個國家的民眾個資、監控海外社群，以便操控輿論及展開認知戰（林詠琪、嚴文謙，2024 年 10 月 21 日；黃名璽，2024 年 10 月 21 日；劉淑琴，2024 年 2 月 27 日）。中共透過民間企業長期蒐集臺灣民眾的相關資訊，以進行政治影響、統戰及認知戰等操作。由此可見，中共的數位威權實踐並非僅限於國內治理，亦延伸至臺灣，透過大規模的網路監控與滲透，對臺灣的國家安全與民主社會構成實質性的威脅與影響。

中共威權擴張下對臺灣的各種干預作為，顯然已成為當前國家安全與社會運作中的重大議題，更對臺灣民主與自由價值構成潛在威脅（吳介民等編，2017；連祉鈞，2025；Jacobs et al., 2023）。特別是在兩岸情勢緊張、兵凶戰危之際，中共透過監控臺灣的網路言論與線上活動，掌握社會氛圍與輿論動態，並以此作為制定認知作戰與統戰策略的依據，進而能更精準地影響臺灣民眾的態度與行為。然而，現有網路監控研究多集中於政府或商業平臺的監控行為（Büchi et al., 2022; Oz & Yanik, 2024; Penney, 2017; Segijn et al., 2022），卻鮮少關注威權國家如何透過跨境型態的網路監控對民主社會民眾造成心理衝擊與行為改變，以及對整體社會的言論自由與公民參與的潛在影響。

目前已有研究初步探討中共網路監控對臺灣社會的影響。研究指

出，當臺灣民眾面對中共網路監控威脅時，具有較高隱私顧慮者更容易產生自我審查傾向（孫懋嘉，2023），並且這種監控感知會引發恐懼、焦慮等負面情緒，進而造成線上寒蟬效應（chilling effect）與隱私保護等相關行為（孫懋嘉，2025）。由此可知，中共網路監控確實對臺灣民眾造成一定程度的心理威脅與行為影響。儘管如此，現階段針對中共對臺網路監控的實證觀察相當有限，對其作為一種跨境監控行為在個人與社會層面的整體影響，尚缺乏更深入的經驗性資料。具體而言，在個人層面，民眾如何感知與因應此類監控，以及其所引發的情緒反應與行為改變，仍有待更進一步的探討；在社會層面，網路監控與線上審查不僅可能縮限資訊透明度與公共討論空間，亦可能降低民眾對制度的信任、政治參與意願，因而影響民主制度的正常運作（Black, 2025; Königs, 2022; Murry et al., 2024; Stoycheff et al., 2020）。基此，若中共持續且大規模地監控臺灣的網路言論與活動，其對臺灣社會之言論自由與公民參與所構成的潛在威脅，實有進一步探究之必要。

綜上所述，本研究聚焦於臺灣民眾在面對中共網路監控時的感知、情緒反應和行為策略，並進一步分析中共網路監控對臺灣社會言論自由與公民參與的影響。透過本研究，期能補足現有文獻在探討跨境網路監控對個人與社會層面影響之不足，為中共數位威權主義的對外擴張提供經驗性佐證，亦為臺灣及其他民主國家在強化對跨境網路監控的理解與因應策略上，提供可資借鏡之實證基礎。

貳、文獻探討

一、網路監控引發的情緒反應與寒蟬效應

從寒蟬效應理論的視角來看，恐懼與風險感知是引發監控寒蟬效應的關鍵心理因素；當個人意識到自身的言論或行為可能被監控、記錄，甚至可能帶來懲罰時，即使尚未實際經歷任何不利後果，也可能因預期性的恐懼而產生自我審查行為（Penney, 2022; Schauer, 1978）。換言之，監控所產生的恐懼和不確定，使人們在內心建立起一套自我審查的準則，以避免從事任何可能被解讀為挑戰公權力的言行。

Stoycheff（2023）的實驗研究進一步驗證了網路監控寒蟬效應形成的心理歷程。Stoycheff 透過實驗操弄隱私政策中 cookies 監控與內容審查的提示，發現當受試者知曉網站使用 cookies 進行監控時，會顯著引發恐懼（fear）與憤怒（anger）等負面情緒。研究指出，cookies 所代表的監控行為，會讓人感受到自己處於被監視的環境中，因而產生威脅感與不安，進而形成政治性寒蟬效應（political chilling effect），降低受試者對公共議題的評論與參與意願（Stoycheff, 2023）。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雖然 cookies 監控與內容審查皆能引發負面情緒，但只有 cookies 監控會顯著導致寒蟬效應，顯示人們對於個資被蒐集與行為被追蹤具有更強烈的威脅感知。

Solove（2006, 2007）指出，現代監控透過資訊蒐集與資料分析，形塑出結構性的權力不對稱，使被監控者失去對自身資料流向與用途的掌控權。這種類型的監控並無需透過直接懲罰行為者，即能藉由「持續被看見」的感知，使人們在日常中自我調整言論與行為。由此可見，面

對監控，人們通常傾向採取更為安全與中性的表達方式，以避免潛在的風險（Penney, 2022）。進而言之，Stoycheff et al.（2019）以實驗方法檢驗政府網路監控對個人行為的影響。第一項研究發現，當人們感知到自己在網路上受到政府監控時，會降低其從事非法下載等違法行為的意圖，展現出嚇阻效果（deterrence effect）；第二項研究則聚焦於政治與隱私保護行為，結果顯示，網路監控也會降低人們對於政治議題的表達意願，因而產生寒蟬效應。這種基於全景監獄式（panopticon）監控的威脅感知，促使人們自我審查，調整自身行為以符合社會與國家預期的「正常」行為。

除政府網路監控外，寒蟬效應的討論也延伸至數據監控（dataveillance）的範疇。Büchi et al.（2022）提出「數據監控寒蟬效應模型」（the model of the chilling effects of digital dataveillance），用以闡釋個人在持續被監控的環境下所產生的心理歷程與行為改變。[1] 該模型指出，當個人因監控事件的揭露或親身經驗而意識到監控的存在時，會加深其對監控的感知。隨著這種感知程度的提升，個人對從事數位溝通行為（digital communication behavior）可能帶來負面後果的預期也會增加，進而對該行為產生更為負面的態度，最終降低其實際從事此類行為的意願。此模型說明了「擔憂負面後果」如何成為監控環境下行為改變的主要心理因素；換言之，即便沒有實際懲罰，只要個人相信自己被監控，便可能產生自我審查的相關行為，如降低公民參與或避免敏感議題

[1] 「數據監控寒蟬效應模型」是以 Ajzen（1991）的「計畫行為理論」（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為理論基礎，強調行為是基於行為意圖與認知評估而產生；依據計畫行為理論，個人的具體行為受到行為意圖的直接影響，而行為意圖則取決於個人對行為的態度、社會環境的主觀規範，以及對自身執行該行為能力的主觀判斷（Büchi et al., 2022）。

的表達。

綜觀相關理論與實證研究可知，網路監控會引發情緒與行為改變，但當前文獻多聚焦於政府或商業平臺監控的範疇，對威權國家進行的跨境網路監控如何影響民主社會民眾的心理與行為，仍缺乏深入的探討。近期研究顯示，當受試者感知到中共對網路和社群平臺進行監控時，傾向出現自我審查行為（孫懋嘉，2023）；而該監控感知也會引發恐懼、焦慮和憤怒等負面情緒，進而導致線上寒蟬效應與隱私保護等行為反應（孫懋嘉，2025）。這兩項研究皆以學生為研究樣本，顯示相關發現主要反映青年世代在面對中共網路監控時的心理歷程與行為傾向。

值得進一步思考的是，臺灣不同年齡層的民眾，在察覺中共於網路空間中監視使用者言論與互動時，是否會出現相似或相異的心理反應與行為調整。部分民眾可能因擔憂自身言論被監控，於談論與中國大陸相關議題時轉趨謹慎，並強化個人隱私保護，以避免個資外洩或承擔潛在風險。儘管前述研究已初步揭示中共跨境監控所引發的寒蟬效應，但對於不同年齡層民眾在此監控情境下如何感知監控和威脅，以及如何約束自身行為的內在歷程，仍缺乏更為細膩的描繪。

二、網路監控對民主社會的潛在影響

資訊與通訊科技（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ies, ICTs）的高度發展促使參與式民主的實踐比以往更加容易（Asimakopoulos et al., 2025; Rattanasevee et al., 2024）。透過網路與行動科技，社會大眾得以突破時空限制，積極參與公共議題討論、政策制定與政府監督，促成更加即時、多元且具包容性的民主運作（Diamond & Plattner, 2011）。然而，資訊科技的便利性同時也帶來隱憂。由於網路

本身具有開放性與可追蹤性的特質，使得個人在網路上的瀏覽行為、言論表達與互動紀錄，皆可能成為被蒐集、分析與監控的對象。當國家進行大規模網路監控時，民眾即便擁有發聲與參與的管道，但實質上卻可能因憂慮自身言論與行動遭到監視而產生自我審查，進而威脅民主社會的核心價值與運作機制（Earl et al., 2022）。換言之，網路監控不僅侵害個人隱私，更可能縮限社會大眾在民主過程中充分參與和表達意見。

確實，政府網路監控會使大眾因擔憂監控帶來的後果而選擇自我審查，進而降低言論自由與公共參與。Murry et al.（2024）對烏干達與辛巴威的民眾進行深度訪談，探究政府網路監控對公民社會與民主運作的影響。Murry et al.透過訪談 44 位曾直接或強烈懷疑遭受政府監控的受訪者（人權工作者、反對黨成員、記者與公民社會領袖），發現政府對社會的大規模網路監控會引發三種寒蟬效應。第一，受訪者為避免遭政府鎖定，會主動採取自我審查，約束自身言論與行動；第二，受訪者傾向拒絕與可能遭監控者互動，以避免被貼上標籤或受牽連；第三，政府網路監控會減少人際間的信任，降低群體的組織與動員能力，使民眾難以對政府產生影響力。由此可知，政府網路監控所引發的寒蟬效應，會危害社會的言論自由與集會自由，長期來說，更會影響民主核心價值及公民參與。

Königs（2022）也強調，當政府將網路監控與法律執行相結合時，特別是在民主體制逐漸傾向威權化的情況下，網路監控通常會被作為打壓異議、限制言論與集會自由的工具，進而侵害基本人權，並危及民主制度的運作。Black（2025）指出，當國家或特定權力者透過大規模網路監控掌握龐大的資訊時，民眾將不敢自由地運用自身的時間與資源來參與政治活動，導致社會大眾更難發聲，權力差距擴大，因而違背民主應保障政治平等的基本原則。再者，Aradau & McCluskey（2022）進一

步指出，當社會大眾普遍將基於安全理由的網路監控視為理所當然之事時，便更容易忽視其對民主價值可能產生的危害。隨著時間推移，網路監控逐漸被視為日常且必要的措施，社會對民主價值的警覺與維護意識因而減弱，對網路監控的抵抗與批判也隨之減少。

基於前述網路監控對民主社會所可能造成的影響，本研究推論，中共對臺灣進行網路監控時，亦可能對臺灣社會構成類似威脅。中共透過跨境網路監控手段，蒐集臺灣民眾的網路言論與行為數據，加以分析與預測，藉此更有效地掌控臺灣社會的輿論動向。更重要的是，當臺灣社會的言論空間受到中共的監控，可能引發寒蟬效應，使多數民眾因擔憂遭受監控而選擇自我審查，進而減少公共議題的參與和討論，甚至影響其在選舉過程中的判斷與抉擇等公民參與行為，導致民主社會的核心價值與運作受到影響。

值得注意的是，現有文獻對此議題仍付之闕如。為彌補上述研究之不足，本研究採深度訪談法，呈現臺灣民眾在中共網路監控情境下的主觀經驗與意義詮釋，進而探討其在日常行為中如何因應與反思監控威脅。基於前述文獻探討，本研究提出下列四個研究問題：（一）在知曉中共對臺網路監控的情境下，臺灣民眾會產生哪些情緒反應？（二）中共網路監控感知會如何影響臺灣民眾的網路言論表達與行為模式？（三）面對中共網路監控的威脅時，臺灣民眾會採取哪些應對策略來保護自身？（四）中共網路監控感知是否進一步影響臺灣社會的言論自由及公民參與？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流程

本研究採深度訪談法探析臺灣民眾面對中共網路監控時的認知、情緒及行為反應，以了解這些反應的樣態與形成原因。本研究透過人際管道招募受訪者，並依立意抽樣原則，挑選不同職業背景的受訪者進行訪談。在 2024 年 9 月至 10 月期間共計訪問 40 位受訪者。整體的訪談時間約 60 分鐘，訪談後受訪者可獲得 500 元禮券作為參與研究之酬勞。

訪談流程部分，受訪者首先閱讀並簽署研究知情同意書，再填寫媒體使用頻率及人口背景資料；完成後，受訪者會閱讀四篇關於中共海外網路監控的新聞報導，[2] 以便對中共網路監控的概念與具體情況有一定程度的瞭解；閱畢後，再開始進行訪談。本研究依據文獻探討及研究問題來設計半結構性的訪談大綱，以利訪談過程中可進一步挖掘受訪者對預設問題以外的看法與經驗。故訪談焦點為在知曉中共對臺網路監控的情境下，受訪者的情緒反應、網路言行及應對策略。

半結構訪談問題如下：（1）您是否曾經意識到來自中國大陸的網路監控嗎？（2）在知曉中共對臺網路監控（社群媒體與即時通訊軟

[2] 四篇新聞報導分別為《聯合新聞網》的〈中共在國際強化網路監控——一場值得警惕的大亂鬥〉（吳介聲，2022 年 1 月 4 日）、《大紀元新聞網》的〈中共網絡言論審查專家：臺灣人也被監控〉（徐翠玲，2022 年 1 月 5 日）、《自由時報》的〈中國情蒐逾 2900 人 臺灣政商藝界全監控〉（自由時報，2020 年 9 月 17 日），以及《NOWnews 今日新聞》的〈日媒爆「LINE 用戶個資遭中國監控」！臺灣官方 4 點回應了〉（NOWnews 今日新聞，2021 年 3 月 17 日）。

體）的情境下，您會有什麼樣的情緒反應？是否感受到不安全或受威脅的感覺？（3）在中共對臺網路監控的情況下，您會傾向避免在網路上討論哪些特定話題呢？這種監控或干預對您的日常生活或網路使用習慣有帶來哪些影響？是否讓您整體的網路行為變得更加謹慎？（4）面對中共網路監控的威脅，您會如何保護自己的網路隱私和安全？（5）您認為中國大陸對臺網路監控是否影響臺灣社會的言論自由及民主運作與實踐（如選舉、公共政策討論等社會參與）（6）您對臺灣在未來應對中共網路監控和保護個人數據的建議有哪些？

在資料分析部分，本研究運用 ATLAS.ti 質性資料分析軟體進行逐字稿的編碼與分析。該軟體可協助研究者在大量訪談資料中進行系統化的整理與歸納，透過建立代碼（code）、類別（category）與主題（theme），以分析受訪者言談中的核心概念及脈絡關係。[3]

二、受訪者特徵

40 位受訪者的年齡介於 21 歲至 60 歲之間，平均年齡為 34.5 歲（*SD* = 11.0）。教育程度方面，專科 3 位（7.5%）、大學 10 位（25%）、碩士 23 位（57.5%）、博士 4 位（10%）。受訪者的職業包含學生、現役軍人、警察、公務員、教育業、資訊業、保險業、不動產業、運輸業、製造業、媒體業、服務業，以及公共行政等領域（詳見附錄：受訪者基

[3] ATLAS.ti 是一款電腦輔助質性資料分析軟體，具備資料管理、資料編碼、資料分析及關聯性視覺化等主要功能。ATLAS.ti 能協助研究者有效地管理大量的質性資料，並且透過主題化的編碼與分類，研究者得以更清楚辨識文本中反覆出現的主題與概念間的脈絡連結和潛在模式；此外，研究者亦可利用其搜尋與過濾工具可深入探索特定主題，以發掘出人工閱讀常難以察覺的細節（Mastrobattista et al., 2024）。

本資料一覽表）。

社群媒體使用方面，受訪者每週平均使用「臉書」14.68 小時（*SD* = 14.33）、「Instagram」18.58 小時（*SD* = 18.88）、「X」2.15 小時（*SD* = 5.18）、「Threads」8.28 小時（*SD* = 13.77）、「微博」0.55 小時（*SD* = 1.96）、「抖音」1.85 小時（*SD* = 5.44），以及「小紅書」2.7 小時（*SD* = 7.10）。即時通訊軟體使用方面，受訪者每週平均使用「LINE」35.3 小時（*SD* = 22.60）、「臉書聊天室」3.7 小時（*SD* = 6.03）、「Telegram」1 小時（*SD* = 3.00），以及「微信」0.55 小時（*SD* = 1.87）。[4]

統獨立場方面，受訪者支持「維持現狀，以後獨立」13 位（32.5%）、「維持現狀，反對統一」22 位（55%），以及「維持現狀，反對獨立」5 位（12.5%）。[5] 赴陸意願方面，受訪者較不願意前往中國大陸「就業或短期出差」（*M* = 2.95, *SD* = 1.54）和「求學或進修」（*M* = 2.63, *SD* = 1.31），但相對較願意前往中國大陸旅遊或參訪（*M* = 3.93, *SD* = 1.64）。[6] 受訪者對中國大陸的整體好感度偏低（*M* = 3.80, *SD* = 2.08）。[7]

[4] 社群媒體與即時通訊軟體的每週平均使用時間之計算方式為「平均每週使用天數」乘以「平均每日使用時間」。

[5] 統獨立場量表援引自蕭怡靖與游清鑫（2012）。

[6] 赴陸意願量表計有三題：「未來我會願意到中國大陸就業或短期出差」、「未來我會願意到中國大陸求學或進修」及「未來我會願意到中國大陸旅遊或參訪」。題目以六點尺標進行測量。

[7] 整體好感度採 10 點尺標進行測量。

肆、研究發現

一、對中共對臺網路監控的感知情形

在 40 位受訪者中，有 14 位表示未察覺或感受到中共針對臺灣網路和社群平臺進行監控的情形，或是也未有相關的親身經驗。例如，一位受訪者表示「其實沒有太多的感受到或是有意識到大陸對於我們的網路監控這個部分」（受訪者 07，女性，26 歲）；另一位受訪者表示：「其實沒有耶，然後好像周遭也沒有聽過說有相關的情況」（受訪者 37，女性，40 歲）；還有受訪者表示：「沒有意識到，因為大概六、七年前還是有到中國去旅遊，沒有特別感受到有監控，甚至到中國大陸當地好像也沒有感受到」（受訪者 08，男性，31 歲）。

然而，其餘 26 位受訪者則對中共網路監控有所察覺，或曾聽聞相關的情況。進一步分析，受訪者對中共網路監控的察覺方式可大致歸納為四種類型。第一種方式是受訪者在日常使用網路及社群媒體的過程中，根據自身經驗感知到中共網路監控的跡象。一位受訪者說：「我自己十多年前是有用人人網跟微博再加上微信……特別是我在十多年前大學生的時候，喜歡發一些比較刺激的言論，喜歡轉貼一些臺灣的新聞，而且知道說他們有在監控，所以知道他們會看，他們也會拿掉這些資訊，不讓他們的人接觸到」（受訪者 22，男性，33 歲）；一位受訪者指出：「因為我會看郭正亮的節目，像是亮劍臺灣、亮點交鋒，然後我就會看到下面很多感覺很像是大陸人的留言，我就覺得它其實一直在監控我們」（受訪者 33，女性，33 歲）。此外，受訪者對中國大陸生產的 3C 產品也持懷疑態度，認為其可能涉及監控機制，如一位受訪者表

示：「因為我覺得大部分的軟體，甚至是硬體裝置，都有被監控的可能性。尤其是比如說你用大陸的微信，那就是大家都知道它一定是有被監控的嘛……或者是你用大陸的不管是 3C 產品，它那一定都是會有類似的可能性」（受訪者 26，男性，39 歲）。

第二種方式是受訪者因工作經驗而得知中共對臺灣進行網路監控。如一位受訪者指出：「因為工作的關係……那我確實知道說中共網路的監控與干預確實是有的，而且遍布在不只是臺灣，還有其他國家」（受訪者 21，女性，57 歲）。第三種方式是受訪者透過數據監控的現象來推測中共可能正在對臺灣進行網路監控。如一位受訪者指出：「現在的手機，我覺得它都有一種監控的功能……手機擺在旁邊，聊天聊到什麼內容，然後可能我在滑 IG 或者是在滑 Facebook 的時候，它推薦的廣告或是推播的一些官方的訊息，就會是跟剛剛聊天內容有關係的。所以，雖然我沒有親身經歷過中國的監控……但是我覺得這件事情是有可能發生的」（受訪者 17，女性，21 歲）。

第四種方式是受訪者本身未曾親身經歷或意識到中共的網路監控，而是透過媒體報導得知相關情況。一位受訪者表示：「我自己本身在使用網路上的時候，我是沒有辦法看出來是不是有監控，但是我相信有蠻多有的，包含是一些國內國外的媒體，然後網友的討論，其實都可以看得到」（受訪者 38，男性，49 歲）。另一些受訪者則是透過家人或朋友的經驗，才了解到中共對網路進行監控，「就是我有朋友他們去大陸做研究或是去旅遊，像 LINE 軟體一定還是會聯絡，但是他們就會跟我說，現在不方便講回去再說」（受訪者 05，女性，39 歲）。

從受訪者的經驗與觀察來看，臺灣民眾對中共對臺網路監控的感知情形呈現明顯的落差。共有 14 位受訪者未察覺中共的網路監控，主要原因是缺乏親身經驗，且也未從其他管道獲得相關資訊。相對地，另有

16 位受訪者透過個人使用經驗、職場專業、數據監控跡象等直接經驗，以及 10 位受訪者透過媒體報導或人際管道等間接經驗，認知到中共會對臺灣的網路與社群平臺進行監控。儘管當前中共對臺網路監控的議題並未受到社會的高度關注，但其對個人及社會的影響卻是不容忽視，值得進一步探究。接下來，本研究將檢視中共對臺網路監控對臺灣民眾的心理影響。

二、中共網路監控引發的負面情緒

在 40 位受訪者中，有 30 位在面對中共對臺網路監控時會產生不同的負面情緒反應，而 10 位則無明顯的情緒感受。值得一提的是，對中共網路監控不會產生明顯的情緒反應的受訪者，主要是因為沒有前往中國大陸的需求、平日不會在網路上揭露個人私領域相關資訊，以及認為網路監控是不可避免之事。例如，一位受訪者表示：「所以它監不監控我，我倒覺得還好，因為我本身就很注重私領域」（受訪者 30，男性，35 歲）；另一位受訪者提到：「我是沒有受到任何威脅或干涉或不安，因為我個人不會去中國。所以，假設我今天有可能因為工作，或是有任何旅遊需要到中國去的話，我就會有些改變」（受訪者 35，男性，59 歲）；還有受訪者表示：「我的感受不會真的非常的負面，或者是非常的抗拒。因為就我所知……歐美的產品也都會有資料回傳的部分。只是或許我們會傾向相信在比較有民主法治的國家，這些回傳的資料會被限制在他們公司總部作為產品最佳化，或者是純粹是商業廣告的應用」（受訪者 28，女性，40 歲）。

本研究發現，因中共網路監控而引發的負面情緒大致上可分為「恐懼與擔憂」、「憤怒與難過」、「厭惡」及「無奈與驚訝」四類：

（一）與「恐懼與擔憂」相關的負面情緒：恐懼、害怕、擔心、不安、焦慮，而引發這些情緒主要來自以下五個因素：

1. 人身安全疑慮與牽連風險

多位受訪者提及，在中共網路監控的情境下，網路上的過往言論或私下對話內容，可能成為未來被調查或遭受懲處的依據，特別在前往中國大陸相關地區時，這種不確定的風險令人感到焦慮與威脅。有受訪者直言：「可能是覺得很可怕，然後會覺得會有點擔心，我被監控到之後，我如果說了什麼，會不會就是被抓走之類的」（受訪者 02，女性，22 歲）。另一位則表示：「假設說我今天可能要出國出差，或者是過境，威脅感就會變大」（受訪者 03，男性，29 歲）。「如果真的去香港或去澳門這種地方……也會因為過去的事情被翻出來，然後會整個被搜查，或是帶到小房間之類的這種事情，所以會對這件事情會比較害怕」（受訪者 06，女性，26 歲）。

更進一步，有受訪者指出，即使未親身前往中國大陸，與其友好的第三國也可能成為風險所在，「因為害怕，就是覺得我可能人身安全會有疑慮，或者是會影響到我周邊的人……如果大陸的手伸那麼深了……當然目前臺灣還沒有說很容易被大陸侵入，那萬一真的到了，剛剛文章有提到，它其實跟大陸友好的國家會直接進去抓人，那其實影響就會蠻大的」（受訪者 23，女性，40 歲）。除了對個人安全的疑慮，也有受訪者擔憂，中共的監控行動可能牽連身處中國大陸的親屬，進而影響其工作與日常生活。如一位受訪者表示：「像我也不太會去中國大陸嘛，可是有時候萬一比如說，你自己的家人，他有需要到中國大陸去的話，你就會比較擔心說會不會因為自己的關係，然後讓可能就是家人受到牽連這樣子」（受訪者 37，女性，40 歲）。另一位則更具體指出：「我哥哥他其實上個月在中國大陸工作。我就會去思考是不是我在網路上面

的一些發言或者是內容會〔讓家人〕受到影響……包括他的工作上面或者是他的生活上面，會不會受到影響，我覺得這個也是會比較擔心」（受訪者 40，女性，24 歲）。

2. 個人生活與隱私受到侵犯

有些受訪者表示，中共網路監控會讓自身的社群媒體、通訊紀錄或網路活動被監視，進而引發對個人隱私外洩與資料被不當利用的憂慮。例如，受訪者指出：「不安全感是會覺得就是我好像被受限制，然後有一種隨時隨地都有人在盯著我看的那種感覺」（受訪者 07，女性，26 歲）；「不舒服的因素，會覺得應該是自己被收集這些我平常的一些習慣或作息、我喜歡的東西之後，下一步它會拿去做什麼？就是這種不安」（受訪者 14，男性，27 歲）。另有受訪者特別強調，自己在網路上已採取隱私保護措施，卻仍擔心資訊可能遭到監控、進而被操控利用，「我的帳密都是設不公開，包含我的 IG 帳號，所以我不想讓陌生人去看到我的生活到底長什麼樣子，但如果說這些事情都遭受到監控……我反而會覺得就是他們知道了我的秘密，然後可能他們會拿捏著我的秘密，然後不知道之後可能在某一個時間會對我做出什麼樣子的反饋，或者是攻擊」（受訪者 19，女性，22 歲）。此外，也有受訪者認為，這種監控機制本身就是對個人生活領域的干涉，並進一步帶來心理上的壓迫，「因為畢竟這種受監控的環境下，它可能會讓我覺得是有意圖要干涉我生活的一種方式，所以當然它會造成我某種不安全的感覺」（受訪者 20，男性，22 歲）。

3. 擔憂言論遭誤判為異議人士

少數受訪者認為，即使自己並未主動發表敏感的言論，仍可能因語意被誤解、或因使用某些關鍵字而被中共誤判為異議分子，進而引發焦

慮。如一位受訪者坦言：「緊張的話是因為，雖然剛剛前面有提到說謹言慎行，但是有時候還是會擔心說自己會不會不小心在網路上留下什麼言論，然後就是被打入了異議分子，所以還是會比較緊張的」（受訪者 18，女性，26 歲）；另一位受訪者也有類似的顧慮，「或許我們並沒有講到大陸不喜歡的關鍵字，可是可能它會誤會我講的話，所以我們在講話的時候就會緊張，然後會很怕被誤會」（受訪者 23，女性，40 歲）。

4. 對國家安全的潛在威脅

部分受訪者認為，中共對臺網路監控是一種對國家安全的潛在威脅。一位受訪者指出：「無論是對其他人或對我們整個國家，的確是會有威脅跟不安全的狀況。因為並不是每個人都能夠意識到這些問題，所以他們有可能會直接把一些事情講出來，然後讓對方可以更理解我們的想法，或者是可能會想要針對這些比較沒有感知的人，當作一個突破的進入點」（受訪者 38，男性，49 歲）；另一位受訪者指出，中共藉由網路監控所施加的壓力，與其政治統一意圖密切相關，「它可能會想要加強它統一我們的速度，會有這樣的感覺，但我個人就是覺得沒有必要做到這一部分，對我們來講也是一種威脅」（受訪者 31，女性，27 歲）。

5. 對臺灣內部監控的聯想

一位受訪者在談及中共的網路監控時，進一步聯想到臺灣內部是否也存在類似的監控機制。此觀點反映出，在面對境外網路監控威脅的同時，部分民眾亦開始對國內政府部門或企業開發的數位工具產生資訊安全上的疑慮。一位受訪者便質疑，「那會不會在臺灣也有受到臺灣的一些部門、開發的軟體也會監測我們」（受訪者 08，男性，31 歲）。

（二）與「憤怒與難過」相關的負面情緒：在中共網路監控的情況下，被監控者會表達出強烈的憤怒、煩躁、不開心及難過等情緒。這些情緒主要源於以下幾個方面：

1. 對民主價值的侵犯與對民主國家的騷擾

受訪者認為，中共的網路監控行為是一種對臺灣民主自由的直接威脅，也是一種政治上的騷擾，「我覺得我會憤怒，我會憤怒的原因是因為這的確就是對一個民主國家明顯的騷擾」（受訪者 15，男性，50 歲）。另一位受訪者則進一步指出，中共若欲推展其政治理念，應以制度競爭與政策吸引為正當手段，而非訴諸對人民進行監控施壓，「我覺得這種事情我會不開心，也會蠻生氣的，因為我覺得這件事情沒有什麼好監控的，就是你想要拓展你的政治版圖，那不應該是對人民們下手……因為他們是極權統治，我們又是屬於民主自由國家，所以會有很強烈的衝突感」（受訪者 31，女性，27 歲）。

2. 網路監控造成心理壓力且影響日常行為模式

中共網路監控所帶來的心理壓力，形同隨時受到「旁觀者」監視，進而影響個人的情緒狀態日常生活與工作。如一位受訪者表示：「有時候其實會蠻生氣的……就是當你自己在做一件事情的時候，有一個旁觀者突然站在你旁邊，那你就會覺得會很浮躁，然後到最後你反而會把事情做不下去」（受訪者 19，女性，22 歲）。另有受訪者將這種心理壓力與香港經驗做連結，擔憂臺灣也將步上需要時刻「小心翼翼」的社會氛圍，「有點像香港一樣，就是變成現在就是要處於一個很小心翼翼、很卑微的狀態……就會為我自己接下來的處境，或是為這個國家的處境，會覺得有蠻難過的那種心情」（受訪者 07，女性，26 歲）。

3. 侵犯個人隱私、干涉日常生活，並對監控無能為力

中共網路監控會侵犯個人隱私，也會對個人日常生活造成干擾。特別是當私密通訊成為監控對象時，更引發強烈的情緒反應。一位受訪者指出：「但是對內比較隱私的通訊，對我來講，它是跟人之間當代最方便溝通的方式，那如果連這一塊都被監控的話，我就會有點覺得，哇，這個有點踩到我的界線……我會覺得憤怒」（受訪者 20，男性，22 歲）。除了隱私被侵犯所引發的情緒之外，有些受訪者亦強調，在無法阻止監控的情況下，會感到更加無力與煩躁。一位受訪者表示：「一個是有人要監控你，但是反過來就是你沒有辦法阻止被監控這樣……就是像是臺灣人民的資料不要被監控，這件事情到底是政府的責任，還是社群平臺的責任，這個究責其實蠻難去區分的，然後實際上你找一個人出來罵也沒有用，所以有的時候應該是煩躁吧」（受訪者 17，女性，21 歲）。

（三）與「厭惡」相關的負面情緒：意識到自己可能受到監控時，會產生厭惡與不舒服的感受，這種情緒主要來自於以下因素：

1. 對中共網路監控行為的否定與象徵性反抗

受訪者明確表達對中共網路監控的不認同，並指出此舉會加深其對中國的負面觀感。如一位受訪者表示：「當然對於這件事情就會覺得，可能會增加我對中國的厭惡感，至於不安全感是還好，如果不去的話，但是會覺得有高度的厭惡感」（受訪者 38，男性，49 歲）。另外，儘管受訪者多數體認到自身難以實質改變監控行為，但仍有部分人選擇以象徵性的方式表達反抗。例如，一位受訪者指出：「一定會覺得不舒服，但也就沒辦法，那人家的平臺，然後感受上當然會覺得可能會有一

點點小小叛逆的心態。例如說……之前我在用小紅書的時候，如果看到有寫一些什麼中國臺灣之類的文章的時候，我就會常按不喜歡此作者……就是一個小叛逆」（受訪者 14，男性，27 歲）。

2. 無端遭監控所引發的反感與壓迫感

受訪者則從個人經驗出發，認為自身並非涉入政治，卻仍無故遭受監控，令人產生強烈的反感。一位受訪者指出：「就是多少會有點不舒服，因為我又不是什麼政治人物，我幹嘛要被監聽，對，我覺得這樣就有一點不太 OK」（受訪者 31，女性，27 歲）。持續性的網路監控更使人感受到生活受箝制，彷彿在「他者注視」下行動，每個舉止都受到潛在審視與紀錄，進而影響日常自由。一位受訪者如此描述：「我覺得如果我現在是已經知道百分之百我不管講什麼、做什麼都會被關注，我就覺得超怪、奇怪，就感覺有一個人一直盯著你做事……做事情就會變成綁手綁腳的……覺得一定會有不舒服的感受，然後就會變得很不方便」（受訪者 39，女性，24 歲）。

（四）「無奈與驚訝」的情緒感受：中共網路監控會讓被監控者表達出一種強烈的無奈感，主要來自於對監控行為的不滿與對現狀無法改變的感受。如受訪者表示：「如果說無奈的話，是會覺得說，讓社會進步或者是改善社會的氛圍其實有別的方法，並不一定說需要使用到這種比較極端的手段」（受訪者 18，女性，26 歲）；「可是我覺得更多的時候應該是很無奈，就是等於你隨時都要處在一個自我審查的情況」（受訪者 17，女性，21 歲）。此外，有些受訪者在得知中共對臺灣進行網路監控時，則產生驚訝且難以置信的反應。如有受訪者表示：「會覺得很不可思議」（受訪者 12，男性，29 歲）；另一位受訪者則指

出：「原則上因為我不是第一次去出差，所以之前去出差時都陸陸續續聽到當地的一些監控方式或說法。聽到這些，其實我也不會有太大的情緒，只是會稍微驚訝他們怎麼會知道」（受訪者 10，男性，46 歲）。

三、中共網路監控引發的寒蟬效應

（一）避免在網路上討論的話題與原因

在中共監控臺灣網路的情況下，受訪者會選擇避免在網路上討論批評中共，或是有關人權、獨立等中共政治敏感的相關話題。如一些受訪者提到：「可能是關於中國的。比如說可能是關於中國的一些不好的言論，可能是比如說中國是個不自由的國家」（受訪者 02，女性，22 歲）；「戰爭吧，然後跟可能像中共這邊它對誰比較友好，或者是對哪一個地方比較有偏見」（受訪者 04，女性，38 歲）；「比如說臺灣要不要獨立啊，或者是批評大陸那邊的一些領導人啊，做事風格啊，或者是歷史的一些資訊」（受訪者 10，男性，46 歲），以及「避免討論就像是新疆人權跟政治，兩岸政治的敏感議題」（受訪者 06，女性，26 歲）。另外，有些受訪者會避免在網路上談論涉及國際政治或臺灣政治相關的話題。一位受訪者指出：「只要是涉入他們現在或是國際發生的事情，比較屬於敏感的事情的話，譬如說美國選舉啊，我都盡量不談，就是有關於政治還有社會一些安全的部分來講，我都會盡量不談」（受訪者 21，女性，57 歲）。

另一位受訪者則不會談論政治和宗教相關的議題，其表示：「因為這兩個議題其實都是爭議性蠻大……它一體很多面，每個人對於自己的政治立場，還有那些宗教信仰都不一樣，所以在網路上我基本上不會去討論這種東西，如果有監控的話更不可能會討論」（受訪者 15，男性，

50 歲）。其次，個人私領域的事情是受訪者也不願意在網路上進行談論。如一位受訪者表示：「也會覺得好像在討論一些比較個人意識、機密一點的事情的時候嘛，就是會覺得也不要透露太多在網路上」（受訪者 07，女性，26 歲）。再者，個人的政治立場表態也是一些受訪者在網路上會避免談到的部分，如一位受訪者表示：「其實我覺得要看政治議題是多上層、多上游。因為如果說你現在是臺灣選舉分藍綠黨，所以打的就是藍綠黨，那可能就比較親中的、比較傾向獨立的，這個明顯的表態我就不會去做」（受訪者 39，女性，24 歲）。

進一步而言，受訪者不願在網路上談論前述話題，主要基於以下幾個重要的考量。首先，個人、親友及談話對方的人身安全是重要的考量因素，因為公開討論涉及中共政權的不利資訊可能帶來潛在風險，因此選擇迴避相關話題來降低風險，如一位受訪者表示：「主要也是說為對方著想啦，就是說盡量避免在上面聊直接涉及到中共政權的一些不利的訊息」（受訪者 25，男性，39 歲）；「我可能就會去避開罵中共領導人的言詞，雖然我也沒有想要罵他的意思。但是我覺得以習近平的個性，將來如果有一天真的不小心兩岸統一了，他一定會清算」（受訪者 24，男性，42 歲）。其次，是否有未來赴陸的需求，也是受訪者決定是否避談敏感議題的重要考量因素之一，如有位受訪者表示：「我發表這些言論有可能會影響我未來是否要去旅遊，或是發展，那也許我就會做一個選擇，這個觀點我覺得是我想要談論的，那我可能就覺得以後不去那裡也無所謂」（受訪者 09，男性，23 歲）。

再者，避免因論及國內政治或法輪功等議題，而被中共歸類或貼標籤，如一位受訪者表示：「因為國內其實會很明顯區分為藍跟綠，你講你喜歡藍就會被認為喜歡大陸，你喜歡綠就會被認為臺獨，所以其實你講國內的事情很容易就會被歸類了」（受訪者 23，女性，40 歲）；「

法輪功，那個部分我也不會去談……避免它把我歸為同類的人」（受訪者 21，女性，57 歲）。另外，工作性質與個性也是影響受訪者選擇是否在網路上討論政治相關話題的因素，如一位受訪者表示，還會避免談論自己的工作，「那避免的部分就很重要的就是工作」（受訪者 21，女性，57 歲）；另一位受訪者指出：「其實政治方面我本來就沒有很喜歡討論，所以就是不管是不是跟中國有關係的事情，我其實本來就不喜歡討論政治，所以我在網路上面本來就不會講這個」（受訪者 14，男性，27 歲）。

然而，若還是想在網路上與他人談論政治敏感議題，受訪者則會改用隱喻的方式來談論。如一位受訪者表示：「好像會避免談到一些真的非常政治性的問題。但是對於他們的主席的人身攻擊什麼的，我好像還是會做。例如說會說小熊維尼什麼的，這種開玩笑式的」（受訪者 03，男性，29 歲）。對於從事教職或教育相關工作的受訪者而言，他們傾向以客觀分析的方式來討論或評析中國大陸政治及其他敏感議題，並刻意迴避過於主觀或帶有鮮明立場的言論。如受訪的大學教師表示：「我純粹就是就觀點而言，那個是比較客觀的，可以討論事情的，我也盡量不把個人主觀的政治意見帶進去，我們就純粹客觀地談那這個事情是什麼樣子，操作起來可能會變什麼樣子，這是不是大家期待看到的樣子」（受訪者 15，男性，50 歲）；另一位擔任營隊講師的受訪者表示：「喜歡寫一些社評之類的，或是政策的評論，但在用字遣詞或是在針對這方面的主題，我可能就會避免用一些比較主觀的評論……就是寫的比較婉轉」（受訪者 13，女性，25 歲）。

（二）網路使用行為的改變

1. 避免使用中國大陸的網路平臺與減少敏感資訊的搜尋行為

部分受訪者會直接避免使用中國大陸的社群平臺，如不使用小紅書、抖音，或避免造訪特定網站，以便降低個資外洩與遭受監控的風險。如受訪者表示：「不會去在類似小紅書或是百度這種，就是可能是他們那邊的網站去搜尋這樣子，我就會比較區隔開來」（受訪者06，女性，26歲）；「就是沒事不要亂下載軟體，尤其是從中國那邊研發出來的科技軟體，像抖音那一類……它們其實很容易被盜」（受訪者31，女性，27歲）。此外，受訪者也會選擇改以電話或面對面溝通，以降低數位足跡被記錄的可能性，「因為知道它有在監控的狀況之下，其實依照現在的科技，你去搜文字實在是太容易就中了，我可能會改成碰面或者是打電話的時候」（受訪者 11，男性，41 歲）。為避免觸及可能被監控的敏感內容，受訪者也會刻意減少搜尋中共相關議題，或避免輸入敏感關鍵字，「我覺得可能在搜尋一些字詞的時候，就不會去真的去搜……比較敏感的字詞」（受訪者06，男性，41歲）。

2. 降低社群參與行為的頻率

在社群平臺上，多數的受訪者選擇避免或降低公開的社群參與行為，包括不按讚、不留言、不分享、不發文，也不轉傳與兩岸敏感議題相關的內容，如一位受訪者指出：「像是按讚、留言、分享，或者是引用這一篇，我都可能會減少，甚至不做」（受訪者 38，男性，49歲）。對於涉及中共的貼文，即便感興趣，也會刻意避免留下互動紀錄。正如另一位受訪者所說：「但是如果當這個東西是牽扯到跟中共有關的話，我覺得我就會選擇去不按讚，因為就會覺得按讚也是留下一個痕跡」（受訪者 07，女性，26 歲）。另外，也有受訪者將此種「去痕

跡」的行為延伸至私人通訊軟體，刻意不透過平臺傳送個人資料或影像，以減少數位足跡與隱私外洩的風險。有受訪者坦言：「LINE 裡面，我就比較不喜歡發我自己私底下沒有打扮好的照片，因為這個照片，它也會有備分……我不想留一個紀錄」（受訪者 22，男性，33 歲）。

3. 持續使用平臺但謹言慎行

有部分受訪者表示會繼續使用中國大陸的社群平臺，但會在言行上更加謹慎以降低風險。有受訪者表示：「在微信就算跟臺灣的朋友講話，也不會講到任何敏感的議題」（受訪者 06，男性，41 歲）；「會用小紅書抖音或是微信……我知道我被監控，但我應該還是會用……日常就是需要看這些娛樂消遣。只是不會在上面做一些發言之類的而已」（受訪者 02，女性，26 歲）。有些受訪者透過限制貼文閱覽對象或避免在公開場合互動的方式，以降低個人立場或言論被監控或蒐集分析的風險。如受訪者表示：「我評論還是會寫，但是我會把它就是控制可以看到的人……如果在轉發或者是我後面有知道這些事情（指中共監控社群媒體）的情況下，我可能會把它設定是隱藏」（受訪者 13，女性，25 歲）。有受訪者認為，轉分享本身就可能透露個人政治傾向，因此選擇避免，「我覺得他們在監控，那我今天轉分享的東西，他們一定會覺得很好奇，你為什麼要轉分享這個東西？」（受訪者 04，女性，38 歲）。另一位受訪者則強調自己僅與熟識者互動，並避免在公開貼文下留言，「如果有發文，最大的權限就是設定為現有的朋友……互動上留言也是我跟實質認識的朋友才會有所互動……如果是在朋友的公開貼文底下，我基本上是不會去留言的」（受訪者 16，女性，42 歲）。

（三）中共網路監控對面對面人際互動的潛在影響

從訪談資料可見，受訪者對於線上網路互動與線下面對面交流在監控風險與言論自由上的主觀感受呈現出明顯區隔。多數受訪者認為，在面對面溝通的情境中，受到監控的風險相對較低，因此較願意表達真實想法。特別是在非公開的私人聚會中，對於敏感政治議題的討論顧慮亦顯著減少。如一位受訪者表示：「因為至少我可能還是相信他們的監控範圍是在網路社群的世界，或者是他們的技術是撈你的資料這種方式來監控，所以可能不會真的影響到我跟別人實際的互動」（受訪者 16，女性，42 歲）。另一位受訪者也直言：「面對面我們人互動的時候怎麼罵，它也管不到我們」（受訪者 01，女性，24 歲）。

然而，雖然面對面溝通被視為相對安全，但仍有部分受訪者在此類互動中表現出因應監控風險的自我保護行為，顯示中共網路監控多少會間接影響面對面的人際互動。具體而言，有受訪者會刻意隔離數位設備，「日常生活的話……我在跟朋友見面聊天的話，首先第一件事情，我會關手機」（受訪者 18，女性，26 歲）；也有受訪者指出，即使不使用手機，單純將其放在身邊也可能造成風險，因此會將手機遠離談話空間，「我覺得見面是唯一比較不會的吧，但是如果你手機放在旁邊可能它還是可以監控，所以要聊，可能手機都不會放在身邊」（受訪者 12，男性，29 歲）。另一位受訪者則指出：「我們如果面對面討論事情，我們就會把手機關掉，因為我們知道背景程式可能也會錄，比較嚴肅的話，我們就會把手機隔絕」（受訪者 22，男性，33 歲）。此外，在選擇談話對象方面，受訪者會根據對方的關係親疏與信任程度調整談話內容，正如一位受訪者所言：「對於同事、長官、朋友，就會盡量不談論。受到監控了，乾脆就不要談論，避免衍生一些不必要的爭端。然後，對家人的部分，應該是沒有問題，就會暢所欲言」（受訪者 27，男

性，46 歲）。

四、面對中共網路監控的應對之道

根據訪談資料，受訪者提到，面對中共網路監控的威脅，個人會採取不同程度的預防與應對策略，同時，政府部門也應提出相應的對策與保護措施。

（一）個人層面的應對策略

1. 設備與軟體安全強化

在硬體選用方面，受訪者特別重視電子產品的安全性。如一位受訪者表示：「硬體我可能會選擇那種比如說像 Apple 的品牌，Apple 會訴諸它對網路隱私權的重視，它可能會在不安全的網路底下去隱藏你的 IP 位置」（受訪者 20，男性，22 歲）；「我也會比較願意花多一點的錢去買，比如說，目前還沒有發現有漏洞的路由器或是攝影機」（受訪者 28，女性，40 歲）。此外，也有受訪者因擔心中國大陸的通訊軟體存有被監控的風險，因而採取使用兩支手機的策略，「一定是兩支手機，我的微信跟只要涉及跟大陸有關的手機，我是另外一個門號……然後手機是二手市場買的，就是一支隨時可以丟掉的手機，那就完全隔絕開……因為我沒有辦法假定說那個每一個通訊軟體背後沒有背景程式」（受訪者 22，男性，33 歲）。在軟體選擇方面，受訪者會優先考量安全性問題，透過選擇正版軟體、架設防火牆，以及避免使用中國大陸相關的通訊軟體，強化個人的網路安全防護措施。如一位受訪者指出：「第一個是就不會選擇使用跟中國有關的即時通訊軟體……但我想要講特定事情的時候可能會考慮至少先用 Telegram，或是再更高可能用 Signal 這種完

全加密的通訊軟體」（受訪者 38，男性，49 歲）；「我老公都會跟我說什麼軟體都要買正版，不要買盜版的，因為他都說買盜版你會被大陸用後門植木馬什麼的，你在幹嘛都會被看到」（受訪者 36，女性，33 歲）。

2. 網路連線與隱私操作習慣

受訪者在日常上網行為中，會藉由提升連線安全機制來因應中共網路監控，包括使用 VPN 來加密網路連線、避免連接公共 Wi-Fi 或不使用 Wi-Fi、開啟無痕模式、設定更嚴格的隱私權限，以及採用通訊加密措施等。例如：受訪者表示：「像我在寫比較敏感的檔案的時候，我一定會關掉 Wi-Fi，因為我不想被追蹤，我也不知道追蹤我的人是誰……那如果要傳輸的時候，一定會加 VPN，而且會假造我人在別的地方」（受訪者 22，男性，33 歲）；「所有必要、被收集、要同意個人資料那些，我全部都會勾不同意……就是把隱私權設到最高」（受訪者 24，男性，42 歲）。此外，也有受訪者會針對帳號安全進行更積極的管理，例如，帳號與用途區隔、定期更換密碼，「會重新思考是不是帳號密碼要去更新之類的」（受訪者 08，男性，31 歲）；「一個匿名的看不出是我的 Gmail……我覺得比較會跟自己本來的帳號隔開」（受訪者 12，男性，29 歲）。

3. 避免使用中國大陸的平臺與服務

部分受訪者會刻意排除使用與中國大陸相關的平臺或產品，以降低被監控的風險。例如，受訪者表示：「比如說就盡量不要用中國大陸的東西，他們的軟體、APP 之類的，至少降低一點風險」（受訪者 37，女性，40 歲）；「硬體設備，像是小米的監控攝影機，還是什麼的，其實我個人會覺得這種東西都是有風險的。雖然說 NCC 都是把關過的，但

是就會覺得充滿著不信任感」（受訪者 03，男性，29 歲）。然而，若中國大陸產品具有高度的實用性，則會採取「有條件使用」的策略，如一位受訪者表示：「如果說真的他們的產品真的非常好用的話，我應該會在一些限定的情況之下仍然持續使用……好像已經有幾款的掃地機器人，有一些資安公司有測出來他們的鏡頭影像似乎是會回傳的。那如果是這種情況之下的話，會在我認為在比較安全或沒有敏感的環境中使用」（受訪者 28，女性，40 歲）。

4. 減少資訊揭露與自我約束網路言行

有些受訪者認為，主動約束自己在網路上的言行，是因應中共監控的一種有效策略，這些行為包括不在社群媒體上發表任何資訊、減少發文次數、發文時的用字更加謹慎，甚至轉而以委婉或間接的表達觀點，例如：「如果是在社群的話，如果要避免的話，最簡單就是減少社群的發言或互動，讓中國比較不會監控到我的行為跟動作」（受訪者 38，男性，49 歲）；「如果 LINE 有被監控的話，我們可能在回話的過程也會用字比較委婉」（受訪者 13，女性，25 歲）。此外，有些受訪者亦刻意避免在網路上揭露個人資訊，如工作內容、身分背景或其他可能暴露自身真實身分的細節，並表示不願將太多個資上傳至網路平臺，甚至避免在網路上對政治立場或敏感議題表態。例如，受訪者指出：「不透露自己的姓名，或是說甚至在帳號這一塊，我就不會真的去寫我自己是什麼名字，或是去透露我念哪間學校，然後各種通訊地址的這一類資訊，我都會去避免」（受訪者 20，男性，22 歲）；另一位受訪者表示：「如果有人談論到一些比較政治相關的議題，或甚至與他們的領導人相關的，基本上我們都會避而不談，或者是簡單地帶過」（受訪者 10，男性，46 歲）。

5. 其他應對策略

除了前述較常見的應對行為外，受訪者在社群媒體上會減少或避免與政治立場極端的朋友互動，以降低被牽連或資訊外洩的可能性。例如，一位受訪者表示：「我有幾個以前的高中同學……就有點臺灣憤青那種感覺，他們對於中共的政治、臺獨、兩岸關係，就會有很多自己的意見跟想法……Facebook 上還是好友的關係，但是他們 po 文、po 什麼，我完全不會按讚，我也不會留言……這個情況再嚴重一點點，我可能就會解除這些人的朋友關係」（受訪者 01，女性，24 歲）。此外，也有受訪者選擇避免前往中國大陸，其表示：「我覺得唯一能做的就是不要去中國大陸。就是我也許有時候我不小心做了一些什麼，或是搜尋了一些什麼，或是發表了一些什麼，可能我自己都不記得，可是已經被記錄下來。那唯一保護人身安全真的就是你不要去，你就得好好待在臺灣，相信臺灣政府會保護人民」（受訪者 24，男性，42 歲）。

（二）政府層面的應對作為

1. 制度與法規層面

部分受訪者認為，政府應從制度與法規層面，建立更為周延的資料保護機制與資安審查制度，因為當前臺灣雖已具備相關法律基礎，但在法規更新、罰則強度及執行力道上仍有強化空間。例如，一位受訪者明確指出修法是降低個資外洩的重要關鍵，「我覺得修法是一定要的，然後，可能在洩露個資的一些懲罰或是罰款上面，可能也要再提升，我覺得會是一個抑制這些事情的好方法」（受訪者 13，女性，25 歲）。然而，也有受訪者指出，目前並非沒有相關法規，而是執行與落實力道不足，「其實法規上是有，但是執行面……我覺得這個法有很多都已經存在，只是政府的執行單位你執行的效果怎麼樣，有沒有很徹底在執行」

（受訪者 34，男性，60 歲）。

此外，部分受訪者也提及產品安全性與事前把關的重要性，強調應從產品設計與上市前審查機制著手，防範資料外洩與監控漏洞的源頭，如一位受訪者指出：「我覺得政府能做到的不一定是減少監控，除非我們就是把個資保護建立得更強大一點……我們的產品在推出之前可以先做一些保障，像是檢查，它到底有沒有安全規格上面的檢查」（受訪者 39，女性，24 歲）。同時，還有受訪者從「資安主權」的角度出發，強調網路服務的資料儲存位置與主控權應掌握在臺灣境內，「我是覺得像網路這種東西，它有一些伺服器，或者是一些硬體設備是儲存資料的，就盡量是落地在臺灣，或者是避免放在對岸那邊。如果今天硬體設備是架設在大陸那邊的話，可能會去做一些盤查」（受訪者 10，男性，46 歲）。

2. 資訊安全與技術層面

部分受訪者強調政府在資訊安全與技術層面必須扮演更積極的角色，以因應中共的網路監控。首先，受訪者希望政府應具備主動防禦與技術反制的能力，而非被動防守，「我相信臺灣的政府應該也有技術可以做到反監控。那是否說如果有技術可以做到反監控的話，應該也有技術去做這樣子的一個隔離，那是不是臺灣政府可以籌備一些部門或是撥一些資金去做這些資料的保密」（受訪者 08，男性，31 歲）。其次，有受訪者主張，政府應針對「主流通訊軟體」加強技術檢測與監督管理，因為使用者通常無法自主選擇使用哪個平臺，而是受到其社交圈普遍使用的平臺所限制，「使用通訊軟體還有一個很大的重點是你的朋友用什麼。所以政府更應該要做的是，針對已經最多人用的通訊軟體去做嚴格的檢查，有沒有做防止監控這件事，然後讓這個措施變得更完善」

（受訪者 38，男性，49 歲）。第三、部分受訪者指出，政府應強化本土企業在資安架構中的角色，並防止中國母公司干預或操控資料傳輸權限。一位受訪者明確建議：「用臺灣的公司做代理商的……必要時，臺灣國安單位可以跟那些公司做一些接洽跟調閱，然後不容許那個公司的對岸母公司做一些干涉。那如果說他們不願意，那就要嚴格的禁止那一類的平臺在臺灣使用」（受訪者 25，男性，39 歲）。

3. 教育與宣導層面

部分受訪者認為，政府應從教育與宣導層面著手，以提升全民對資訊安全與數位風險的基本認知，進而降低因認知不足所造成的個人暴露風險，並強化整體社會的防護意識與對政府的信任基礎。有受訪者指出，臺灣政府本身已具備一定的資安專業與防禦能力，若能透過有效溝通，讓民眾理解這些能力，有助於提升社會對抗監控風險的信心，「我們的政府其實是有一些單位是非常專業的……能告訴我們的人民，我們臺灣政府有能力去抵抗這些監控，然後讓我們其實覺得有被保護的感覺」（受訪者 24，男性，42 歲）。另有受訪者認為，當前民眾對「網路監控」的理解程度有限，甚至缺乏基本概念，因此政府應從「基礎教育」做起，培養全民對中共網路監控現象的基本認知與風險意識。「一個層次是對內的教育吧……因為對於這種境外的監控……其實對於我們的民眾來講……甚至連網路監控四個字的定義都有點不太知道。所以，我想從教育做起的話，可以讓大家去意識到這個問題，第一時間最該做的事情是什麼……讓他們至少對自己本身先有一個保護」（受訪者 20，男性，22 歲）。

再者，有受訪者提出應從生活經驗與具體案例切入，逐步培養民眾的資安意識，而不應一開始就以抽象的威脅作為主軸，「我建議就是一步一步建立使用網路媒體跟手機的安全意識」（受訪者 22，男性，33

歲）。此外，受訪者點出具體宣導方向，例如，避免使用中國大陸盜版軟體，以降低被植入後門程式的風險，「宣導盡量不要買那個大陸盜版軟體這樣子，會比較安全一點」（受訪者 36，女性，33 歲）。

五、中共網路監控對臺灣社會言論自由的影響

整體而言，多數受訪者認為中共的網路監控確實對臺灣社會的言論自由造成干擾與限制，特別是在政治敏感議題的討論上更為顯著。部分受訪者指出，網路監控使得民眾在公共討論中變得更為保守，甚至導致特定立場難以被充分表達，「我覺得會影響蠻大的。首先大家可能都不太願意多做評論了……就是比較不會有一些反方的立場出現，那我覺得這是一個危機感」（受訪者 03，男性，29 歲）。有受訪者指出，網路監控會導致人們避免表達真實想法，僅以敷衍或中性語言回應敏感話題，「你或許就是會敷衍他，或是講一些場面大家都會講的話」（受訪者 34，男性，60 歲）。更有受訪者擔憂，若這樣的自我約束成為普遍風氣，將會讓臺灣社會陷入「一言堂」的言論氛圍，進一步讓自由討論的空間逐漸萎縮，「整個臺灣在網路上談論的東西漸漸被這種壓抑感跟束縛感給過濾……那最後就會跟言論自由這個感覺相互背離」（受訪者 20，男性，22 歲）。

此外，若個人有意赴中國大陸發展，網路監控亦可能促使其自我審查，迎合中國的政治意識形態以避免留下不利紀錄，「如果他想要在中國有所發展的話，他的言論會呈現出某一種迎合中國意識形態的需求」（受訪者 15，男性，50 歲）。有受訪者也點出，社群平臺上與臺獨相關或對中國具批判性的言論，特別容易受到監控與限制，「主要還是臺灣獨立這方面的言論，還有攻擊、損害中國大陸的一些言論，這方面的

可能就是會受到限制」（受訪者 08，男性，31 歲）。

然而，也有部分受訪者認為，中共的網路監控行為對臺灣社會的言論自由影響有限，但臺灣社會有法治與言論保障機制，使人們即使知道網路監控的存在，仍能保持自主發言的空間。一位受訪者表示：「我覺得臺灣人一直都是蠻勇敢的一群人……就算你們監控我們，但是有我們的言論自由，有我們的自主權……不會因為你們這樣子的威脅，然後讓我們有所退縮」（受訪者 07，女性，26 歲）。有受訪者指出，網路監控尚未對日常生活造成具體影響，因此並未改變其發言習慣，「我覺得現在還好，就是因為可能監控，你看我們都已經知道它在監控，只是也沒有對我們的生活造成一些影響，所以我是覺得不會有影響，所以還好」（受訪者 12，男性，29 歲）。另有受訪者認為，臺灣社會對隱私與資料安全仍保有一定程度的信任，「大家對於臺灣的法治，還有這些隱私權的保障，還是有一定程度的信任……不至於會資料外流到讓大陸去監控，我覺得一般人的想法應該會是這樣」（受訪者 13，女性，25 歲）。不過，也有受訪者指出，這樣的安心感建立在尚無懲罰性案例的基礎之上，若出現「殺雞儆猴」事件，恐將迅速引發寒蟬效應，「我覺得在還沒有任何一個案例被殺雞儆猴之前，他們都不會被約束到，但一旦有任何一個案例發生就會有寒蟬效應」（受訪者 29，女性，22 歲）。

受中共網路監控影響的並非所有人，而是較集中在某些特定類型的群體。首先，立場中立、政治敏感度低，或對中國持開放態度的受訪者，較傾向保守發言以規避風險。如受訪者指出：「我覺得如果是相對來講比較站在中立，或者是比較傾向中國，但是他本身對政治比較不敏感，或是他討厭政治的人……他們不會想要在裡面留下任何不好的紀錄」（受訪者 38，男性，49 歲）；「中立或藍的那邊我覺得會比較

怕」（受訪者 36，女性，33 歲）。此外，公眾人物、媒體工作者與意見領袖，也可能因自覺曝光風險而進行自我審查。有受訪者指出：「這個應該是公眾人物吧，尤其是政治人物，或者是政論節目的一些評論員，如果他知道他在這個監控的範圍……在批判的時候，他可能就會有一點保留了啦」（受訪者 34，男性，45 歲）。相對而言，政黨立場也會影響受訪者的行為選擇與風險感受。有受訪者便認為：「我覺得政黨傾向只要是偏綠的人感覺都沒有在怕」（受訪者 36，女性，33 歲）。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多數受訪者認為中共網路監控會縮限臺灣社會的言論自由，但有部分受訪者認為，中共網路監控反而會激發更強烈的言論表達意願，甚至以挑釁、批判作為對監控的回應。在察覺自己遭受監控後，反而更積極表達立場，甚至以激烈言辭挑釁中國。如有受訪者坦言：「如果說我知道它監控我的話，我會更刻意地去挑釁中國的一些相關的議題，我會罵得或是講得更難聽」（受訪者 35，男性，59 歲）。亦有受訪者指出，這樣的監控壓力可能強化其臺灣主體意識與反抗傾向，「可能就會覺得說，他想獨立的心就會更推往極端的方向，不願意被壓迫」（受訪者 29，女性，22 歲）。甚至有受訪者觀察到身邊親友的反應也偏向積極表達的立場，「我覺得他們會更想要發表更多他們對於兩岸立場的意見」（受訪者 28，女性，40 歲）。整體而言，這樣的反向反應與保守迴避行為構成對比，呈現出臺灣社會在言論自由面對外部壓力時的兩極化反應，正如一位受訪者所言：「應該會有兩種極端……一種是明哲保身的不談論，一種是瘋狂地罵……以臺灣的網路上的氛圍的話，應該會有兩種情況」（受訪者 18，女性，26 歲）。

六、中共網路監控對臺灣社會公民參與的影響

從訪談資料可知，多數受訪者認為，中共對臺網路監控雖未完全壓抑臺灣社會對公共議題的討論，但已對民主參與的表現形式造成某種程度上的潛在干擾，反映出中共網路監控對民主社會的言論環境具有間接性的影響。

（一）對公共議題討論的影響

首先，有受訪者明確指出，中共的網路監控已改變政治時事節目中網友留言的參與模式，「我覺得像很多政論節目，它其實比較鼓勵網友們留言互動，我覺得這類節目的影響比較大」（受訪者 05，女性，39歲）。其次，有受訪者指出網路監控會促使言論極端化的趨勢，使得網路討論場域呈現「敢講者更敢講、沉默者更沉默」的分化現象，其表示：「我覺得會變得更兩極化……臺獨跟親中兩個立場會變得非常明顯……反而中間選民就不會去表達任何意見」（受訪者 03，男性，29歲）。

另一方面，也有受訪者指出，願意參與公共議題討論者本身即具備較高表態傾向，因此網路監控對其影響相對較低，「願意討論的人就會知道這是一個表態的行為，所以我覺得對他的影響會比較低一點」（受訪者 38，男性，49 歲）。這種觀點強調，對某些人而言，討論本身即是意識型態的實踐，風險反而成為激發表態的動力。然而，也有受訪者提醒，對於政治冷感者或原本就不積極參與政治的人來說，監控感知可能進一步加深其疏離感與冷漠態度，「就是說有些他可能不投票，或是對於政治比較不關心的人，或許會有些影響」（受訪者 35，男性，59歲）。

另一方面，也有少數受訪者指出，正是因為臺灣社會深植的民主風氣與對言論自由的高度重視，使部分民眾即使面對監控風險，仍堅持持續表達意見，展現出一定程度的心理韌性與對言論自由的價值實踐。一位受訪者指出：「我覺得背後的原因會是……我們如果不講也有可能帶來危險，那為什麼不講的那種心態」（受訪者 07，女性，26 歲）。此外，也有受訪者指出，資訊參與的形式與技術條件會影響民眾的表達意願，尤其是匿名性較高的機制（如網路民調）較能降低風險感知，進而提升參與意願。如受訪者表示：「如果是網路民調的話，其實我覺得民眾……好像會比較願意表達自己的想法」（受訪者 05，女性，39 歲）。

（二）對選舉的影響

多數受訪者認為中共網路監控將對臺灣選舉產生潛在影響，因為網路監控可作為一種影響選民投票傾向的策略性工具。這些影響主要可歸納為三個層面：

1. 對選情操作的可能性

部分受訪者明確指出，中共可透過監控網路言論與數據，掌握臺灣社會氛圍與民意走向，進而調整對臺政策或製造兩岸議題，影響臺灣選情。受訪者指出：「我覺得選舉是一定會有多少影響，因為等於說他們有掌握到某些情資，然後一定會針對這個再去做某些對策」（受訪者 16，女性，33 歲）。另有受訪者提到，如果中共認定某政黨對其構成威脅，就可能透過輿論操作來降低其支持度，「那他今天就可以對臺灣做出相應的政策，那這樣就會影響民眾對於兩岸的危機感……對於臺灣的選舉是影響蠻大的」（受訪者 32，女性，30 歲）。

2. 對選民言論與資訊流通的干擾

監控行為也影響了選舉期間的政治言論環境，影響候選人與選民之間的正常互動。有受訪者指出，因擔心被監控，候選人與一般民眾皆傾向自我審查，不敢自由表達立場，進而影響選舉資訊的交流與討論，「大多數的人還是先保護自己為優先……甚至或許連候選人本身也都不太敢那麼把自己的想法提出來，那這樣其實勢必一定會影響到我們的選舉跟民主」（受訪者 18，女性，36 歲）。

3. 中間選民的態度與行為容易受影響

多位受訪者指出，中共網路監控對中間選民的影響特別顯著。由於中間選民在選舉中常扮演關鍵的搖擺角色，一旦感受到過多資訊操作與監控壓力，可能會出現政治冷感、不投票，甚至轉向支持反中候選人的傾向。一位受訪者表示：「我也算是灰色地帶的一員……太多訊息了，我就會反而覺得說講得太亂，那我不如不要投票」（受訪者 19，女性，25 歲）。另有受訪者指出，監控壓力反而可能讓部分選民「修正」投票方向，「這件事情可能會趨向他投向反對中國的那些候選人」（受訪者 38，男性，49 歲）。

伍、結論

一、研究發現與討論

本研究透過對 40 位受訪者的深度訪談，探究臺灣民眾對中共網路監控的感知，以及該感知如何影響其情緒反應、行為模式及應對策略，

並進一步分析民眾對中共網路監控在民主社會中影響言論自由與公民參與的看法。研究結果顯示，受訪者對中共對臺網路監控是否存在的認知程度並不一致。16 位受訪者曾在自身經驗中察覺相關監控情形，10 位主要透過媒體報導或人際互動間接意識到此現象；另有 14 位受訪者在訪談前並未察覺中共會對臺進行網路監控。無論受訪者先前是否知悉或察覺中共對臺網路監控，在得知後，多數受訪者皆表示其情緒與行為會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整體而言，本研究歸納出以下幾項重要研究發現。

（一）負面情緒反應的樣態與意涵

本研究發現，中共網路監控感知會讓受訪者產生恐懼、焦慮、氣憤、難過、厭惡、無奈與驚訝等多種負面情緒。在這些情緒反應中，部分與既有網路監控研究的發現相同（Penney, 2022; Stoycheff, 2023），但在中共對臺網路監控的脈絡下，其情緒來源與意涵則呈現出不同面貌。本研究顯示，受訪者通常會將中共網路監控感知延伸為對潛在負面後果的風險評估。具體而言，恐懼與擔憂的情緒反應，主要來自對人身安全、隱私外洩，以及遭誤認為異議人士的疑慮。這顯示，中共跨境網路監控在受訪者心中不再僅被視為單純的監視行為，而是被理解為可能影響實質利益與人身安全的風險來源，使其監控感知呈現出更為具體且明確的威脅性。至於氣憤、難過和厭惡等情緒，則多源於受訪者對中共網路監控侵害臺灣民主價值、干擾日常生活的否定與反感；而無奈與驚訝，則反映出受訪者面對中共網路監控時，對現狀難以改變的無力感，以及對監控存在本身的難以置信。綜言之，即便中共政權無法對臺灣民眾實際施加懲罰，其跨境網路監控本身仍具備「數位跨境鎮壓」（digital transnational repression）所指涉的威脅特性（Michaelsen &

Thumfart, 2023），足以在心理層面對受訪者造成實質的壓力與不安。

（二）線上和線下的自我審查行為

中共網路監控感知會改變民眾日常生活中的線上行為模式，並進一步影響線下的人際互動。在線上行為層面，受訪者所呈現的自我審查行為，可區分為「個人言論自我審查」與「網路行為自我審查」兩種型態。就前者而言，多數受訪者會避免批評中共或討論涉及中共的政治敏感議題，部分受訪者甚至進一步迴避國際與臺灣政治相關話題；就後者而言，受訪者會調整網路使用習慣，避免使用中國大陸的網路與社群平臺（如小紅書、抖音等），減少搜尋與中共相關議題，並刻意避免輸入敏感關鍵字。在社群媒體上，受訪者會降低發文、按讚、留言及分享的頻率，即使對相關內容感興趣，也會避免留下可追蹤的紀錄；同時，在即時通訊軟體中，傳送個資與分享私領域資訊亦變得更加謹慎。而這些自我審查行為，主要反映出受訪者對自身與親友人身安全的顧慮、對未來赴陸發展或往來風險的評估，以及對遭中共貼上政治標籤後可能衍生不利影響的擔憂。

至於線下人際互動層面，雖然多數受訪者認為，面對面的溝通不會直接受到中共網路監控的干擾，但部分受訪者因知曉智慧型手機的語音助理會自動蒐集談話內容，在交談時會刻意將手機關閉，或移出談話空間，以降低操遭到監控和資料外洩的疑慮。此外，當談話內容涉及中共政治或其他較為敏感議題時，受訪者也會視談話對象的關係親疏與信任程度調整表達方式：面對較親近且信任的人，較能自在地表達看法；反之，則多半選擇避開相關話題，或以較為保留的方式表達。

（三）對中共網路監控的抵抗與反制

儘管中共網路監控感知會引發受訪者的自我審查，但仍有些受訪者並未完全受到寒蟬效應的影響，而是藉由隱喻、玩笑、婉轉語言等創意性迴避策略，或限制貼文可見範圍等技術性方式規避監控機制，以維持自我表達與社群連結。這顯示，即便處於網路監控情境下，部分民眾仍展現行動自主性，運用各種「戰術」（tactics）加以反制，進而形成一種「日常抵抗」（everyday resistance）的實踐；這些在中共網路監控下的「日常抵抗」不僅是一種心理防衛，亦是構成對中共跨境網路監控手段的象徵性挑戰（de Certeau, 1984; Scott, 1985）。[8]部分受訪者甚至在察覺監控後展現出更強烈的表達意願，透過諷刺、戲謔或挑釁的方式回應監控。此現象與 Penney（2017）的研究觀察相呼應：雖然網路監控時常會引發寒蟬效應，但在特定情境下，被監控者亦可能以挑戰或反抗的方式來回應監控威脅。換言之，中共網路監控並非必然限縮臺灣社會的言論自由，反而在某些情況下激發民眾以更具能動性的方式進行抵抗。

（四）應對中共網路監控的個人與制度性策略

在面對中共網路監控時，受訪者於個人層面的應對策略主要體現在硬體與軟體的使用選擇上。在硬體方面，受訪者通常使用具備較佳的隱私保護功能的電子產品，或透過不同裝置區隔操作中國大陸軟體與應用

[8] Scott（1985）在《弱者的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中提出「日常抵抗」概念，用以描述在威權或權力不對等情境下，弱勢群體以隱蔽、非直接對抗性且具象徵性的方式進行反抗，例如透過諷刺、謠言、嘲笑等日常行動，來減弱權力結構的支配效力。de Certeau（1984）認為，「戰術」（tactic）是一種「弱者的藝術」，指個人在無法擁有自主空間的權力結構中，以靈活、臨時且機會性的方式行動於他者的空間，藉此在日常實踐中應對或轉化既定的秩序。

程式，以避免個資外洩或網路行為被追蹤。在軟體方面，部分受訪者則會避免安裝盜版程式及使用中國大陸的網路平臺與服務，同時加強網路安全防護（如設定防火牆等），以降低潛在監控風險。此外，有些受訪者刻意減少與政治立場極端者的線上互動，以避免日後遭受牽連。這些應對策略與過往研究的結果相同，在網路監控的情境下，人們通常會加強現有的隱私保護措施或避免揭露更多的個人資訊與網路足跡（Dinev et al., 2008; Paine et al., 2007）。

在法規制度與政策層面，多數受訪者認為，面對中共的網路監控與滲透，政府有必要建立更為周延的資料保護機制與資安審查制度，並確實強化相關制度的執行與監督機制；同時，政府應從「資安主權」的角度，制定相關法規，確保網路服務的資料儲存位置與主控權掌握在臺灣境內，以降低境外勢力對國內資安的威脅。在技術層面上，受訪者期待政府應具備更積極的主動防禦與技術反制的能力，並強化本土企業在資安體系中的角色，以避免中國母公司介入或操控資料傳輸權限。至於教育層面，受訪者則認為，政府應透過持續的教育與宣導，提升社會大眾對網路監控威脅的辨識與防禦能力，強化全民對資訊安全與數位風險的基本認知，以培養基本的資安意識與自我保護能力。

（五）中共網路監控對言論自由與公民參與的影響

本研究發現，中共網路監控對臺灣社會的言論自由與公民參與會受到一定程度的負面衝擊。多數受訪者認為，中共網路監控會使民眾在政治敏感議題的發言上趨於保守，部分立場與觀點因此難以充分表達，導致公共議題的討論意願逐漸降低。此現象與 Murry et al.（2024）的研究發現有相似之處，顯示無論監控主體是境外勢力或本國政府，網路監控通常會壓縮公共議題的討論空間，導致社會言論自由受到影響。若此種

自我審查與迴避現象持續擴大，恐將進一步限縮臺灣社會的言論空間。然而，有些受訪者則認為，中共網路監控的威脅可能反而激化公共討論場域的極化現象，呈現出「敢講者更敢講、沉默者更沉默」的現象，進而降低了中間選民的表達意願。此外，一些受訪者也擔憂中共可能藉由監控與分析臺灣網路輿情，透過輿論操作干擾社會大眾或中間選民在選舉過程中的思考與判斷，進而影響投票取向。確實，若此類監控事件持續發生，將使社會大眾在公共事務上的表達意願下降，導致言論自由受限與公民參與萎縮，進而影響民主社會的正常運作（Black, 2025; Büchi et al., 2022; Königs, 2022）。

二、研究貢獻

本研究在理論與實務層面具有以下三個貢獻：（1）現有理論在跨境網路監控的應用與延伸：本研究發現驗證了現有研究的結果（孫懋嘉，2023、2025），顯示中共跨境網路監控感知確實會讓受訪者在言論表達與社群互動上傾向自我約束；此發現亦可與美國國家安全局監控全球網路所引發之寒蟬效應研究結果相互參照（Marthews & Tucker, 2017; Teknologirådet & Datatilsynet, 2014）。中共跨境網路監控寒蟬效應的形成機制，可由寒蟬效應理論加以解釋：當個人預期自身的言行可能招致不利後果時，即使尚未實際遭受懲罰，也會因恐懼與不確定感而選擇自我約束或保持沉默（Penney, 2022; Schauer, 1978）。

此外，Büchi et al.（2022）所提出的「數據監控寒蟬效應模型」亦可進一步說明中共網路監控感知對受訪者情緒與行為影響的歷程。當受訪者意識到中共網路監控時，會認為在網路上討論涉及中共政治敏感相關議題可能引發不利後果，進而對相關行為產生更為負面的態度，最終

降低了參與相關議題討論的意願，呈現出明顯的自我審查傾向。整體而言，本研究延伸寒蟬效應理論（Penney, 2022; Schauer, 1978）與數據監控寒蟬效應模型（Büchi et al., 2022）的適用範圍，揭示威權國家的跨境網路監控能在民主社會中引發心理威脅與自我審查，補充了既有理論在跨境網路監控主題著墨較少的侷限。同時，本研究也發現理論未預期的面向——跨境網路監控不僅可能會造成民眾的自我審查，亦可能激發具創意性的日常抵抗方式。

（2）質性取徑揭示面對跨境網路監控的經驗歷程：本研究以深度訪談資料，補充現有以量化為主的中共對臺網路監控研究之不足。藉由質性資料的分析，本研究揭示臺灣民眾在面對中共網路監控時的情緒、行為與認知歷程，以及中共網路監控對社會層面的言論自由與公民參與之影響，呈現出量化研究難以發掘的細緻經驗與多元觀點，為了解中共數位威權主義擴張下的社會反應，提供了重要的參考依據。

（3）跨境網路監控對民主治理的實務意涵：本研究指出，面對威權國家跨境網路監控時，民主社會亟需強化自身的反監控治理能力。藉由完善跨境資料流動的審查機制與規範、提升資安法制的執行效能、強化公共與民間部門的資安防護能力，以及確保數據平臺的透明度與監督機制，方能在數位威權主義擴張的環境下，使民主開放的社會能在自由與安全之間取得穩定的平衡。

三、研究限制

本研究主要的限制有二。第一，受訪者對中共網路監控的感知可區分為直接與間接兩類。前者多源於個人經驗或專業背景，例如曾使用中國大陸網路平臺、從事資安相關工作或觀察到可能的監控跡象；後者則

主要透過媒體報導或親友轉述等間接途徑形成。然而，兩者在情緒反應與行為傾向上並無明顯的差異。這可能與本研究採用的訪談設計有關：受訪者需在「知曉自身遭中共網路監控」的前提下，回應其可能產生的情緒與行為反應。由於所有受訪者皆基於相同的威脅感知進行思考與回應，無論是否具備親身經驗，其心理與行為層面的反應趨於一致。故未來研究可進一步探討不同感知來源（直接經驗與間接感知）如何影響情緒反應、網路行為與公民參與，以補足本研究在此方面的限制。

第二，本研究為呈現不同民眾對中共網路監控的感知與反應情形，採立意抽樣方式挑選不同背景之受訪者，並透過深度訪談了解其經驗與觀點，希冀研究結果能較為深入地反映臺灣民眾的實際情況。然而，研究樣本多以中青年且教育程度較高者為主，年長族群與低教育程度者的觀點與經驗相對欠缺，導致研究結果在族群分布和代表性上有所侷限。基此，未來研究可在質性取徑下增加樣本的多樣性，納入不同年齡層、教育與社經背景的受訪者；同時，亦可根據本研究訪談資料的重要發現設計問卷，並結合具全國代表性的量化調查，以驗證本研究結果並提升其外推性。

參考書目

自由時報（2020 年 9 月 17 日）。〈中國情蒐逾 2900 人 台灣政商藝界全監控〉，《自由時報》。https://news.ltn.com.tw/news/world/paper/1400275

吳介聲（2022 年 1 月 4 日）。〈中共在國際強化網路監控——一場值得警惕的大亂鬥〉，《聯合新聞網》。https://opinion.udn.com/opinion/story/120611/6008706

吳介民、蔡宏政、鄭祖邦編（2017）。《吊燈裡的巨蟒：中國因素作用力與反作用力》。左岸。

林詠琪、嚴文謙（2024 年 10 月 21 日）。〈NHK 追安洵外洩文件　中國政府監控民眾個資「包括台灣」〉，《民視新聞網》。https://www.ftvnews.com.tw/news/

detail/2024A21L10M1
孫懋嘉（2023）。〈數位威權主義下中共對臺網路監控寒蟬效應之評估〉，《遠景基金會季刊》，24(2)，55-101。
孫懋嘉（2025）。〈中共跨境網路監控對臺灣民眾的影響機制：情緒中介下的寒蟬效應與隱私保護行為〉，《中國大陸研究》，68(3)，39-79。
徐翠玲（2022 年 1 月 5 日）。〈中共網絡言論審查 專家：台灣人也被監控〉，《大紀元》。https://www.epochtimes.com/b5/22/1/5/n13483629.htm
徐薇婷（2020 年 9 月 22 日）。〈振華數據非隨機挑選 包定：中國情蒐台人意在收買恐嚇〉，《中央通訊社》。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2009220120.aspx
連祉鈞（2025）。〈探析與重審中共對臺的認知作戰：多模態框架視野重構下的跨領域傳播〉，《臺灣傳播學刊》，47，1-60。
黃名璽（2024 年 10 月 21 日）。〈NHK 分析安洵外流文件 發現輿論操控工具助打認知戰〉，《中央通訊社》。https://www.cna.com.tw/news/aopl/202410210182.aspx
劉淑琴（2024 年 2 月 27 日）。〈中國資安公司安洵文件外洩 揭北京網攻台灣、監控海外社群〉，《中央通訊社》。https://www.cna.com.tw/news/aopl/202402270376.aspx
蕭怡靖、游清鑫（2012）。〈檢測台灣民眾六分類統獨立場：一個測量改進的提出〉，《台灣政治學刊》，16(2)，65-116。
NOWnews 今日新聞（2021 年 3 月 17 日）。〈日媒爆「LINE 用戶個資遭中國監控」！台灣官方 4 點回應了〉，《NOWnews 今日新聞》。https://www.nownews.com/news/5214550
Ajzen, I. (1991).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50*(2), 179-211. https://doi.org/10.1016/0749-5978(91)90020-T
Aradau, C., & Mc Cluskey, E. (2022). Making digital surveillance unacceptable? Security, democracy, and the political sociology of disputes.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ociology*, *16*, 1-19. https://doi.org/10.1093/ips/olab024
Asimakopoulos, G., Antonopoulou, H., Giotopoulos, K., & Halkiopoulos, C. (2025). Impact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on democratic processes and citizen participation. *Societies*, *15*(2). https://doi.org/10.3390/soc15020040
Black, A. (2025). AI and democratic equality: How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and computational propaganda threaten democracy. In B. Steffen (Ed.), *Bridging the gap between AI and reality* (pp. 333-347). Springer.
Büchi, M., Festic, N., & Latzer, M. (2022). The chilling effects of digital dataveillance: A theoretical model and an empirical research agenda. *Big Data & Society*, *9*(1). https://doi.org/10.1177/20539517211065368

de Certeau, M. (1984).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Diamond, L., & Plattner, M. (Eds.). (2011). *Liberation technology: Social media and the struggle for democracy*.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Dinev, T., Hart, P., & Mullen, M. R. (2008). Internet privacy concerns and beliefs about government surveillance: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The Journal of Strategic Information Systems*, *17*(3), 214-233. https://doi.org/10.1016/j.jsis.2007.09.002

Earl, J., Maher, T. V., & Pan, J. (2022). The digital repression of social movements, protest, and activism: A synthetic review. *Science Advances*, *8*(10), eabl8198. https://doi.org/10.1126/sciadv.abl8198

Jacobs, C. S., Ng, L. H. X., & Carley, K. M. (2023). Tracking China's cross-strait bot networks against Taiwan. In R. Thomson, S. Al-khateeb, A. Burger, P. Park, & A. A. Pyke (Eds.), *Social, cultural, and behavioral modeling* (pp. 115-125). Springer Nature Switzerland.

Königs, P. (2022). Government surveillance, privacy, and legitimacy. *Philosophy & Technology*, *35*(1), 8. https://doi.org/10.1007/s13347-022-00503-9

Marthews, A., & Tucker, C. E. (2017). Government surveillance and internet search behavior. *SSRN*. Retrieved Octorber 23, 2025, from 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2412564

Mastrobattista, L., Muñoz Rico, M., & Cordón García, J. (2024). Optimising textual analysis in higher education studies through computer assisted 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 (CAQDAS) with ATLAS.ti. *Journal of Technology and Science Education*, *14*(2), 622-632. https://doi.org/10.3926/jotse.2516

Michaelsen, M., & Thumfart, J. (2023). Drawing a line: Digital transnational repression against political exiles and host state sovereignt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8*(2), 151-171. https://doi.org/10.1017/eis.2022.27

Murray, D., Fussey, P., Hove, K., Wakabi, W., Kimumwe, P., Saki, O., & Stevens, A. (2024). The chilling effects of surveillance and human rights: Insights from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Uganda and Zimbabwe. *Journal of Human Rights Practice*, *16*(1), 397-412. https://doi.org/10.1093/jhuman/huad020

Oz, M., & Yanik, A. (2024). Fear of surveillance: Examining Turkish social media users' perception of surveillance and willingness to express opinions on social media. *Mediterranean Politics*, *29*(1), 1-25. https://doi.org/10.1080/13629395.2022.2046911

Paine, C., Reips, U.-D., Stieger, S., Joinson, A., & Buchanan, T. (2007). Internet users' perceptions of 'privacy concerns' and 'privacy ac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Computer Studies, 65*(6), 526-536. https://doi.org/10.1016/j.ijhcs.2006.12.001

Penney, J. W. (2017). Internet surveillance, regulation, and chilling effects online: A comparative case study. *Internet Policy Review*, *6*(2). https://doi.org/10.14763/2017.2.692

Penney, J. W. (2022). Understanding chilling effects. *Minnesota Law Review*, *106*(3), 1451-1530. https://doi.org/10.24926/265535.4359

Rattanasevee, P., Akarapattananukul, Y., & Chirawut, Y. (2024). Direct democracy in the digital age: opportunities, challenges, and new approaches.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Communications*, *11*(1), 1681. https://doi.org/10.1057/s41599-024-04245-1

Schauer, F. (1978). Fear, risk and the First Amendment: Unraveling the chilling effect. *Boston University Law Review*, *58*, 685-732.

Scott, J. C. (1985). *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 Yale University Press.

Segijn, C. M., Opree, S. J., & van Ooijen, I. (2022). The validation of the Perceived Surveillance Scale. *Cyberpsychology: Journal of Psychosocial Research on Cyberspace*, *16*(3), 9. https://doi.org/10.5817/CP2022-3-9

Solove, D. J. (2006). A taxonomy of privacy.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 *154*(3), 477-564. https://doi.org/10.2307/40041279

Solove, D. J. (2007). "I've got nothing to hide" and other misunderstandings of privacy. *San Diego Law Review, 44,* 745-772. https://papers.ssrn.com/abstract=998565

Stoycheff, E. (2023). Cookies and content moderation: Affective chilling effects of internet surveillance and censorship. *Journal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Politics*, *20*(2), 113-124. https://doi.org/10.1080/19331681.2022.2063215

Stoycheff, E., Burgess, G. S., & Martucci, M. C. (2020). Online censorship and digital surveillan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ppression technologies and democratization across countries.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3*(4), 474-490. https://doi.org/10.1080/1369118X.2018.1518472

Stoycheff, E., Liu, J., Xu, K., & Wibowo, K. (2019). Privacy and the panopticon: Online mass surveillance's deterrence and chilling effects. *New Media & Society*, *21*(3), 602-619. https://doi.org/10.1177/1461444818801317

Teknologirådet, & Datatilsynet. (2014). *Chilling down in Norway*. Datatilsynet. Retrieved October 23, 2025, from https://www.datatilsynet.no/globalassets/global/english/nedkjoling-i-norge_eng_.pdf

Zhang, A. (2020, September 17). *China data leak points to massive global collection effort*. Voice of America. https://www.voanews.com/a/east-asia-pacific_voa-news-china_china-data-leak-points-massive-global-collection-effort/6196030.html

附錄：受訪者基本資料一覽表

受訪者編號	性別	年齡	職業
受訪者 01	女	24 歲	碩士生
受訪者 02	女	22 歲	碩士生
受訪者 03	男	29 歲	雜誌社專案企劃
受訪者 04	女	38 歲	職業軍人（士官）
受訪者 05	女	39 歲	博士生
受訪者 06	女	26 歲	國防部聘員
受訪者 07	女	26 歲	學校行政人員
受訪者 08	男	31 歲	電子業工程師
受訪者 09	男	23 歲	大學生
受訪者 10	男	46 歲	製造業
受訪者 11	男	41 歲	職業軍人（軍官）
受訪者 12	男	29 歲	軟體工程師
受訪者 13	女	25 歲	營隊講師
受訪者 14	男	27 歲	電視臺企劃
受訪者 15	男	50 歲	大學教師
受訪者 16	女	42 歲	大學教師
受訪者 17	女	21 歲	大學生
受訪者 18	女	26 歲	碩士生
受訪者 19	女	22 歲	軍校生
受訪者 20	男	22 歲	碩士生
受訪者 21	女	57 歲	檢調人員
受訪者 22	男	33 歲	博士生
受訪者 23	女	40 歲	警察
受訪者 24	男	42 歲	檢調人員

受訪者編號	性別	年齡	職業
受訪者 25	男	39 歲	博士生
受訪者 26	男	39 歲	房仲業
受訪者 27	男	46 歲	運輸業
受訪者 28	女	40 歲	資安人員
受訪者 29	女	22 歲	碩士生
受訪者 30	男	35 歲	海巡人員
受訪者 31	女	27 歲	保險業
受訪者 32	男	22 歲	軍校生
受訪者 33	女	40 歲	實習心理師
受訪者 34	男	60 歲	民代助理
受訪者 35	男	59 歲	民代助理
受訪者 36	女	33 歲	職業軍人（士官）
受訪者 37	女	40 歲	外交人員
受訪者 38	男	49 歲	資訊業
受訪者 39	女	24 歲	碩士生
受訪者 40	女	24 歲	碩士生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The Impact of China's Online Surveillance on Democratic Society: Perceptions and Responses of Taiwanese Citizens

Mao-Chia Sun*

ABSTRACT

Media coverage in recent years has reported tha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surveils overseas online spaces, monitors public opinion on Taiwan's major social media platforms, and collects data on Taiwanese public figures. These practices suggest that the CCP's digital authoritarianism extends beyond its borders and to Taiwan, posing threats to national security and democratic functioning. Few studies examine how such surveillance shapes Taiwanese citizens' emotional and behavioral responses and at the societal level affects 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civic participation.

This research investigates how Taiwanese citizens perceive and respond to the CCP's online surveillance by analyzing their perceptions, emotional reactions, and behavioral adjustments and assesses the implications for 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civic participation. In doing so, it addresses key gaps in the literature on the individual- and societal-level impacts of transnational online surveillance and provides empirical evidence of the CCP's outward extension of digital authoritarianism.

This paper presents in-depth,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with 40 Taiwanese participants recruited through interpersonal networks via purposive sampling to ensure occupational diversity. Interviews were conducted between

* Mao-Chia Sun is Associate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Taiwan. e-mail: mcsndu@gmail.com.

September and October 2024, lasted about 60 minutes, and participants received a NT$500 gift voucher. Before their interview, participants gave informed consent, completed a short survey on media use and demographics, and read four news articles on the CCP's overseas online surveillance to establish a baseline understanding. Transcripts were coded and analyzed using ATLAS.ti.

From the interview data, this study identifies the following key findings.

(1) Patterns and Implications of Negative Emotional Responses

Once participants perceived CCP online surveillance, they commonly reported negative emotions such as fear, anxiety, anger, sadness, disgust, helplessness, and surprise. Under transnational surveillance targeting Taiwan, their reactions often became risk assessments of potential harm. Fear and concern stem largely from worries about personal safety, privacy breaches, and being misidentified as a political dissident, indicating that surveillance is seen as a concrete threat. Anger, sadness, and disgust reflect perceptions that undermine Taiwan's democratic values and intrudes on everyday life, while helplessness and surprise signal powerlessness and disbelief. Overall, even without formal legal jurisdiction over Taiwanese citizens, the CCP's transnational online surveillance exhibits the threatening features of digital transnational repression, generating substantial psychological distress and insecurity.

(2) Online and Offline Self-Censorship

Perceived CCP online surveillance has reshaped participants' online practices and to some extent their offline interactions. Online self-censorship comes in two forms: personal expression and online behavior. Participants often avoided criticizing the CCP or discussing politically sensitive issues, with some even further withdrawing from Taiwanese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topics. They also adjusted their digital routines by avoiding China-

based social platforms, reducing CCP-related searches, and steering clear of sensitive keywords. On social media, they posted, liked, commented, and shared less to minimize traceable footprints, while on messaging apps they became more cautious about sharing personal or private information. Concerns for personal and family safety, perceived risks tied to future engagement with China, and fears of political labeling drive such behaviors.

While most participants saw face-to-face communication as less constrained, offline some took precautions like turning off or moving cell phones away, due to concerns about audio capture or data leakage. When sensitive topics arose, they also calibrated their speech based on trust, speaking more openly with close contacts and avoiding or moderating discussion with less trusted interlocutors.

(3) Resistance and Countermeasures in Response to CCP Online Surveillance

While perceived CCP online surveillance induces self-censorship, some participants were not fully deterred by any chilling effect. Instead, they employed creative coping strategies, such as metaphors, jokes, indirect language, or restricting post visibility, to evade monitoring while sustaining self-expression and social ties. This underscores continued individual agency under surveillance, as participants used tactical forms of everyday resistance that serve both as psychological protection and a symbolic challenge to transnational surveillance (de Certeau, 1984; Scott, 1985).

Heightened awareness of surveillance in some cases even intensified participants' willingness to speak out, with them using sarcasm, humor, or provocation to confront perceived threats. This resonates with Penney's (2017) argument that surveillance can sometimes provoke defiance rather than silence. Overall, the CCP's online surveillance does not uniformly suppress expression and may under certain conditions elicit more agentic and oppositional

responses.

(4) Individual and Institutional Strategies for Responding to CCP Online Surveillance

Participants' individual-level responses to the CCP's online surveillance primarily involved hardware and software choices. They favor electronic devices with stronger privacy protections and in some cases use separate devices for China-based apps to reduce data leakage and behavioral tracking. They also avoid pirated software and China-based platforms, strengthened cybersecurity settings, and have limited interactions with individuals with extreme political views to reduce potential repercussions. These practices align with other findings in which surveillance encourages stronger privacy protection and fewer identifiable digital traces (Dinev et al., 2008; Paine et al., 2007).

At the institutional level, participants stress the need for stronger data protection and cybersecurity review regimes, backed by enforcement and oversight. They further call for cyber sovereignty regulations to keep data storage and control within Taiwan's jurisdiction. They also want more proactive governmental defense and countermeasures, a stronger role for domestic firms to prevent external interference, and sustained public education to enhance digital security awareness and literacy.

(5) Impacts of CCP Online Surveillance on 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Civic Participation

Perceived CCP online surveillance is seen as undermining 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civic participation in Taiwan. Most participants note that citizens are more cautious when discussing politically sensitive issues, making some viewpoints harder to express and reducing engagement in public debate. This is consistent with Murry et al.'s (2024) argument that online surveillance constrains deliberative space. If self-censorship continues to spread, then

Taiwan's discursive environment may become further restricted.

Participants also suggest that surveillance threats may intensify polarization, creating a dynamic in which "the outspoken become more outspoken while the silent grow quieter" and discouraging expression among moderate voters. Some further warn that the CCP could exploit online monitoring to manipulate information during elections, shaping perceptions and influencing voting behavior. Over time, these dynamics may weaken civic engagement and undermine democratic functioning (Black, 2025; Büchi et al., 2022; Königs, 2022).

Keywords: civic participation, China's online surveillance, self-censorship, freedom of expression, chilling effect